

老城遗迹展示——

天津鼓楼博物馆

天津鼓楼名为鼓楼，实为钟楼，始建于明洪武四年（公元1371年），历经数次战火后重建，是天津市的发源地，是城内布局的轴心。2001年，重建后的鼓楼宏伟典雅，青砖墙面，白玉栏杆，飞檐斗拱，碧瓦丹楹，油漆彩绘，雕梁画栋。鼓楼有四门，分别为“拱北”、“定南”、“镇东”、“安西”，其上有楷书匾额。其建筑规模为27米见方，高27米的体量。



天津鼓楼博物馆



板桥胡同场景

走入鼓楼博物馆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复原的鼓楼城墙，在城墙下面摆放着1921年重修后的鼓楼北门洞上的“拱北”石匾。一楼二楼的展厅主要推出了“老城遗韵”基本陈列。展览由两大部分组成，第一部分着重介绍了明清两代天津老城修建、整葺、拆除的变迁过程，描述了城池内外公署迭立，民居纷建，商贾云集，街衢涌现，庙宇寺院星罗棋布的历史过往；第二部分着重介绍了长芦盐商及其后代在天津城市文化的形成、发展过程中扮演的主要角色，南来北往的文人名士在津吟诗作赋、鉴赏书画、刊刻

书籍等文化活动，概述了明代天津卫学的建立，清代州、府、县学的出现。

展厅里，商会的匾额、老城内的街巷门牌……应有尽有，一件文物——清代末年天津估衣街达仁堂药店的算盘，吸引了大家的注意，这个算盘长3.06米，有117位，售货员可以随时或多人同时核算，反映了当时的店铺规模和商业的繁荣。在众多展品中，北门外出土的守卫天津城的明代铁炮、清代铁炮弹和天津文庙大修时发现的“文学戳记”字样青砖均为首次展出。展览中还特别复原了“板桥胡同”以及清代学堂等场景，体现了当时商

贾云集的景象以及书院教育的勃兴。近代以后，新式学堂遍布城厢内外。文化、教育的合力发展使天津城市的文脉得到传承、光大。

展厅中还特别设置了播放天津老城厢的介绍视频和天津老城的沙盘。展厅内，大量的历史照片仿佛把人们又带回了老城的那个年代。市民李先生指着展柜里的一张图片说：“八国联军拆了城墙，痕迹就是现在的东马路、南马路、西马路、北马路，我们从照片上又看见城了。这个照片就是当时实际情况的真实写照。”为了丰富展览内容，鼓楼博物馆

还推出了“中西文化的交汇图片展”“光影留痕——天津老城厢地区历史照片展”等主题展览。一位观众介绍：“我从小在老城厢长大，对这块地方，有着特殊的情感。老城厢有很多天津的传统民俗，现在都找不到了。好在当时还有胶片，能记录下那个时候的记忆，这是天津卫的历史，也是天津人脚下的根。”

鼓楼博物馆的一二楼为固定展厅，三四层为临时展厅。多年来，还推出了音像资料展、书画展、车模展、天津民俗展等，让观众更多地了解天津的历史特色和人文风貌。

故宫珍宝——

青花花卉锦纹双耳扁瓶

明永乐青花花卉锦纹双耳扁瓶，高24.3厘米，口径3.5厘米，足径7.4厘米。

瓶蒜头口，束颈，圆形扁腹。口肩连以对称的如意耳，腹两侧正中各凸饰一乳钉纹，璧形底座，无款识。瓶口边绘如意纹，腹部纹饰以六角星开光向四周伸展构成六边形锦式开光，开光内绘折枝花、缠枝花、朵花、团花、江崖海水等纹饰，足边绘朵梅纹一周。

此瓶造型仿自阿拉伯铜器，纹饰的题材与布局都具有西亚风格。



青花花卉纹执壶

明洪武青花花卉纹执壶，高38.8厘米，口径7.4厘米，足径11.5厘米。

壶直口，细长颈，折肩，长腹，圈足。颈一侧为壶柄，另一侧为长方形流，流口呈葫芦形。壶颈部绘缠枝花，肩部饰莲瓣纹，腹部饰八面方形开光，每一开光内饰上下两朵花卉，足部饰卷枝纹。

明初青花银、铜器造型者很多，除执壶外，还有折沿盆、花浇、盘座、烛台、扁腹瓶等。



青花九龙闹海纹碗



明成化青花九龙闹海纹碗，高7.8厘米，口径17.2厘米，足径7厘米。

碗撇口，深弧壁，圈足。外口绘钱纹一周，外腹部海水地上绘不同形态的龙9条。碗内底青花双圈内饰海水龙纹。圈内足施白釉，青花双圈内置青花楷体“大明成化年制”双行六字款。

此器纹饰生动，腹部淡描海水，浓绘九龙，形态威猛生动，气势夺人。成化青花器以青色淡雅著称，此器青花深浅相对，更烘托出神龙之矫健，为成化青花瓷中的罕见佳作。

青花夔龙纹罐

明宣德青花夔龙纹罐，高19厘米，口径15.8厘米，足径13.8厘米。

罐直口，鼓腹，内圈足。内外施白釉，外饰青花纹样。颈与肩部饰如意头纹。腹部绘2只首尾相连的夔龙衔花纹。近底处绘一周仰莲瓣纹。底施白釉，青花双圈内楷书“大明宣德年制”六字款。

宣德青花图案以线条流畅、纹饰豪放生动著称。夔龙纹样用于青花瓷始于宣德朝，至成化时已成为瓷器上的典型图案，后世亦多沿用。宣德时所用青料据明万历时王世懋《窥天外乘》和黄一正《事物纪原》中所记为“苏麻离青”，这种青料含铁量高，含锰量低，在适度的窑炉气氛下烧成后能呈现宝石蓝般鲜艳的色泽，但由于含铁量高，在青花色彩上常自然形成不均匀的黑色结晶斑点，与艳丽的蓝色相互映衬，更增其艺术魅力。此罐之青花色泽即具有这一时代特征。



青花荷塘游龙纹碗

明弘治青花荷塘游龙纹碗，高7厘米，口径16厘米，足径6厘米。

碗撇口，口下渐收，圈足。里口绘青花海水纹一周，碗心绘莲池游龙纹。外壁绘两条龙在莲池中穿行，随着龙的游动，莲花、水草亦呈翻舞状。足底青花双圈内双行楷书“大明弘治年制”六字款。

莲池纹在元代陶瓷器物上已经出现，明初永乐、宣德时将莲池纹与龙纹相结合，弘治时承继，并成为该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纹饰题材之一。此碗釉白质润，纹饰线条纤细柔和，青花呈色蓝中微带灰色，是弘治青花中具代表性的器物。



天津地名故事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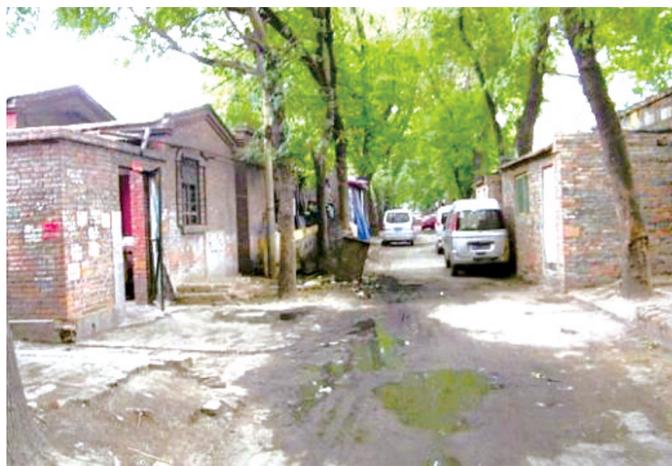
王串场

王串场所指的区域，大致就是由真理道、金钟河大街、红星路和新阔路这四条道围成的地方，这片地在清雍正八年（1730年）以前归武清管，最早是农田和荒野，地广人稀的开阔地，所以那时被称为东开。到了乾隆末年，人口开始逐渐向这里迁徙，最早集中在此地的东北部，后来住户越来越多，形成了村落。

当时在村子里，有一户从南方来的姓王的人家，这家的户主叫“王串子”，此人厚道，在当地人缘很好。王串子一家在东开了田，又找了一块地势非常好的地方，平整之后做了打谷场。很多小户人家知道王串子厚道，一到秋收时就借王家的打谷场干活。久而久之，到“王串子家的打谷场”变成了“王串子场”，因为天津人说话爱“吃”字，最终简化成了“王串场”。一直沿用至今。

民国初，王串子的后人重返祖籍，把祖田和打谷场卖给了一个叫张俊川的富户。1937年，日本攻占天津，为了便于统治，在1940年把老王串场村分成张家胡同、崔家胡同、黄家胡同等几块区域。

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，人民政府在老王串场金钟路以南建立了王串场工人新村，都是平房大杂院，一排一排的，划分为十五段至二十六段。据老人说这里当年没有排水设施，一到雨季都要在家里预备红砖、



王串场旧街貌

泥土、塑料布，好在下雨时用这些东西把门缝都堵住，可就算这样，屋里还是得进水，下大雨时锅盆碗灶都在屋里飘着……真理道附近还好一些，地势比较低，增产道就不行了，地势最低，同样的情况下积水能比真理道深30厘米左右。

除了雨季积水问题，当年王串场新村的居民用水也特别紧张，水龙头

设置在胡同里，几十户用一个水龙头，不但水压低，而且水竟然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咸的，当年很多人调侃王串场的自来水都能直接腌咸菜……

如今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，早已成了天津老城夹缝中的历史，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被人们忘记，但“王串场”这三个字，却永远记录了几百年岁月变迁。

童年生活——



粘知了

顽童们都玩过粘知了。知了的学名叫做蝉，知了的叫法因不同区域的孩童习惯而不同，比如有的地方叫季鸟。每到夏季顽童们听到了滋滋叫的知了，习惯地抬头望树，也练就了好眼神。知了中有会叫“知道了，知道了……”在树上叫得好好听，但当抓住它的时候，它就只是吱吱叫了，这也许就是知了的语言吧。

粘知了的道具很简单，粘知了的胶有用废旧轮胎里的里带，还有用胶皮手套的，有的将香油掺在里面，用一个铁勺放在火炉上烧烤，熬成胶；还要找一根竹子，梢子处要细软，在竿头上抹上熬制的粘胶。

顽童们扛着长长的竿子出发了。循着叫声通常很容易发现知了的藏身处，这时候，领头的伙伴就转身竖起手指，示意后面跟着的顽童们别出声。把竿子靠上比较结实的枝干上，然后慢慢地伸向那只黑黑的家伙的后面，当快接近的时候，会屏住呼吸让竿头更稳，以免提前惊动它。当粘胶接触到知了的翅膀，它就无法逃脱了，“吱一啦，”惊恐的知了只得得及惊叫一声，就扑腾着到了顽童们手中。它瞬间发出的叫声，显得很急促，也很吵人，但是顽童们却很愿意听到这样的叫声。

有的时候，知了会提前发现，会“吱”的一声飞去，同时撒下一泡尿来，来不及躲避的顽童被淋在仰着的脸上……

传统小故事——

城南诗社的重阳雅集

赵进杰

城南诗社是近代天津最著名的旧体诗词团体，诗社除了定期酒集外，每逢传统节日亦常有集会，其中又以重阳诗会持续最久、影响深远。

诗社元老李琴湘在为《乙亥重阳雅集诗录》所作的序中称：“重阳之会，吾乡严范孙先生于城南诗社提倡甚早，但非必年年作会，亦非必会有诗。”由此可见，在城南诗社成立之初，重阳雅集就已存在，只不过并非每年都会举行，即便举行也不一定有社友间的诗词唱和，因此影响不大。1925年的重阳节，李琴湘在自己的寓所择庐招集社友宴饮，席间众人分韵赋诗，颇为尽兴。自此以后，每年重阳节李琴湘都会在择庐宴请同人，每次必有赌酒敲诗、题赠唱和的文学活动，重阳诗会从此成为定例。不过重阳诗会也并非每年都在阴历的九月九日这一天举行，比如1930年重阳节期间，李琴湘因病滞留北平，无法回津组织诗会。为了弥补缺憾，于是他援引前人“补重阳”之例，在返回天津后于九月十九日补作重阳诗会。此后直至1933年，城南诗社的重阳诗会都只在李氏寓所择庐举行。

1933年，城南诗社同人除了于九月九日照常在择庐举行重阳诗会以外，还由严修之子严智怡召集，于10天之后在水西庄旧址举行了一次重阳雅集。在这次集会上，众人再次分韵赋诗或填词，随后由王守恂将众人诗作辑为《癸酉展重阳水西庄酬唱集》一卷并印制行世。鉴于此次水西庄唱酬搞得比较成功，翌年，严智怡便与李琴湘相商，欲将城南诗社以后每年的重阳诗会改在水西庄举行。李琴湘有自己的考虑，因为在择庐举行的重阳诗会至今已为第10个年头，从未间断，如果今年改在别处进行，则“打破十年成数”。但李琴湘又不好拒绝严智怡的提议，“乃议定早水西而晚择庐”，“约以来年”再完全改作水西之会。因此，1934年的重阳节当天举行了两次雅集，上午在水西庄，晚上在择庐，分别进行分韵赋诗，诗作各印一小册，是为《甲戌重阳雅集诗录》，可惜今已失传。1935年初，严智怡不幸去世，李琴湘依然践行君子之约，决意将重阳雅集的地点从择庐移至水西庄。当日与会者24人，众人拈阄分韵，纷纷赋诗，后由李琴湘将这些诗作辑为《乙亥重阳雅集诗录》。1936年的重阳节，水西庄迎来了更大规模城南社友们的诗会雅集，是日主客到者36人，至此城南诗社的重阳雅集达至极盛。